

一个叫缪泾的文学故乡

□宋祖荫

每个人的心中,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熟悉的、难忘的、刻骨铭心的地方,那就是梦魂萦绕的故乡。对作家们而言,也有一方心驰神往的“文学故乡”。故乡究竟代表着什么?可谓见仁见智,它也许与童年、自然、人性、本真、记忆等有关,乃至可为家乡立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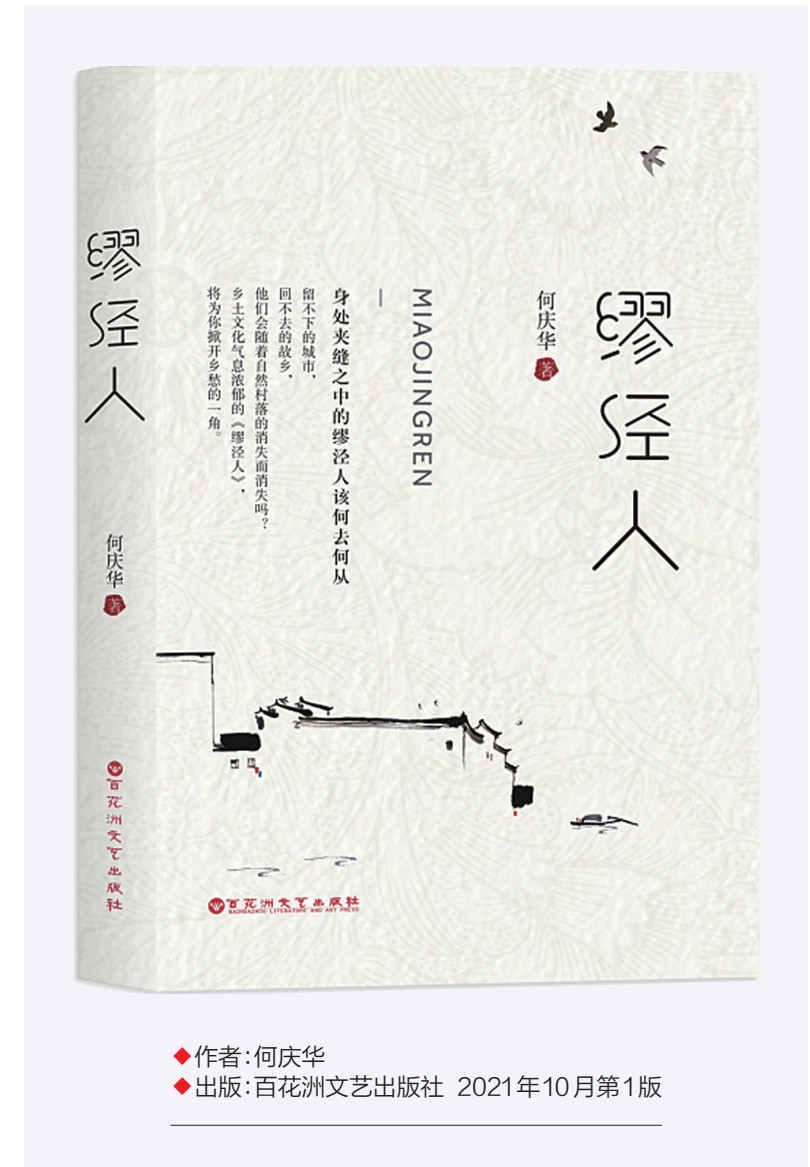
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百年孤独》,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以描写自己的故乡而出名的,并影响了许多文学大家。马尔克斯8岁时离开故乡,16岁时就雄心勃勃地构筑起以故乡为蓝本的成长小说。他给它取名为《家》,设想故事在布恩迪亚家族的家里展开。这便是《百年孤独》最早的萌芽。马尔克斯写作故乡的起源,则是为了故园不再孤独。

打住,回到中国的文学故乡。乡土文学,现当代再次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汪曾祺、迟子建、莫言、刘震云、贾平凹等一批文学大家成为中国乡土文学的“标杆”。这些小说在题材上都是以小村庄寓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人物的兴衰展示文化冲突中的宏阔社会历史图景。而他们描写的小村庄,很大一部分是取材于自己的故乡,甚至是描绘自己的故乡,如江苏高邮、黑龙江漠河、山东高密、河南延津、陕西西安等。2018年出品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再现了当代6位文学大家回到故乡的真实场景,让人们加深对文学故乡的情感认知。

缪泾,江南水乡福地的一条河。在水网交织、河流密布的江南,是再普通、再寻常不过的了。然而在中国作协会员、《缪泾人》作者何庆华的心目中,它是一个反复咀嚼与顿觉领悟的地方,一个挣脱枷锁与冲破藩篱的地方,一个人生抗争与命运奋斗的地方。

江南的故事,人生的传奇,在这个名叫缪泾的地方总能依稀地寻觅其留下的烙印。因此,对何庆华来说,缪泾有着文脉之根、精神之系。《缪泾人》是个中短篇合集,7个既独立又承接的篇章内容,讲述了发生于时代与社会大背景下的沧海一粟——缪泾,揭示了这些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和悲欢离合,这里的故事发源,都是真实的写照;书中的人物塑造,都能找出其原型的模样。源自生活,哪怕一个地名,一个厂名,读起来倍加亲切,就是一个寻常村落的家长里短。

“缪泾虽然是我的出生血地,童年少年的生长地,然而,由于我的父母不是原住民,还有点当年知识分子穷酸、迂腐的味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还是很难融入原生态村落的原



◆作者:何庆华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1年10月第1版

住民生活之中,我们还是属于缪泾的外乡人、另类人。”何庆华说道。正是这个特殊的人文背景,她对缪泾的认识是独特的、理性的,甚至还略加隔膜、审慎的意味,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跋涉江湖日久,赤子之心依旧。在何庆华看来,当缪泾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时,也成就其笔下营建的那片乡愁之地,那片文学故乡。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现实,缪泾曾给她留下的孩童记忆,那是尘封的、包裹着爱恨交织在一起的。但是随着岁月的洗礼,将过去的恨逐渐遗忘,沉淀下来对缪泾的念想除了爱,还是爱。于是作者以散文化的笔触、诗一般的意境,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一幅烟雨氤氲、或美轮美奂、或春华秋实的江南田野诗画图。

中学时代,她就是个文学青年,喜

欢涂鸦点诗歌、散文之类,在校园里小有名气。她终于从田埂上走了出来,去了一个离缪泾很远的安徽某城市读书,学了令人羡慕的医师专业。后来回到家乡,名正言顺地当起了厂医。正因为爱好文学的缘故,她白天在工厂上班,夜间做起了广播业余主持人。在一个唯美的《书香小屋》的节目空间,倾诉着对文学的爱好,憧憬着未来文学的梦幻。后来,她错把他乡当故乡,经历了一场青春代价的“桃李劫”。

梦醒时分,她又回到了故乡。她是坚强的、率真的。在她的散文集《桃李劫》中,诉说着那段不幸的世间遭遇,也让她学会了怎样坦然面对人生,笑对生活。幸运的是,她终于落脚在媒体单位,可继续发挥着她的文学爱好,恣意挥洒她那字里行间的天马行空。

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让何庆华对人间世风炎凉有了更加清醒的认知。于是她萌发了一个酝酿已久的念想,以缪泾为自己心中的文学故乡,把一个江南小村落的时代嬗变写出来,于是其父母、村干、乡邻、同学、同事都化为她笔端下的人物形象,且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开篇《马桶西施》,用马桶、西施两个文学意境的营造,既互不搭界,但又参合一起,组成了一个特殊时代下农村普通平民夫妻的畸形的爱。面对生命的美好与人生的困境的顽强对峙,道出了人性的扭曲与泯灭,世间的种种险恶弊端,让人们感受到缪泾人的浓重岁月裹挟与负重前行。如《蓝月亮》中缪根生忍辱负重的扶贫路,给人以正能量的熏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也把缪泾人的爱心传递到远方的秦岭。还有《最后的老克拉》中由其父亲为原型塑造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痴呆与压抑的博弈,以及折磨、榨干的生活窘境,让人产生悲悯和悲愤。

《虎姐》《小焉》两篇人物取名的题材小说格外亮眼。“虎姐”“小焉”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当年时代发展与变迁的见证。在虎姐的身上,伴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命运交响,家人为虎姐出钱买城市户口的举动,以及虎姐当了不久城里人的厄运,从光鲜、无奈到窘迫的突变,最终其想回归乡下的村庄……在虎姐这个人物身上,折射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农民的呐喊与抗争;然而小焉的命运则与虎姐有所不同,小镇上的评弹演员小焉,与旗袍高手萧师傅,都是传统文化的苦行僧和守望者,经过一番颠沛流离,折磨挣扎,终于安家乡村小镇,作者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让人们看到了乡村原野一丝的慰藉与亮色。

由于每个人的的人生经历不同,对故乡的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近乡情更却,不敢问来人”“不知何处吹羌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等吟咏故乡美好的诗句朗朗上口,信手拈来。面对故乡,触景生情,苦尽甘来,这种怀乡之情依然形影相随,无法释怀。此刻也许正是《缪泾人》这本书营造出一番别样心境情绪的真实写照。

“没有心灵家园的人是没有根的,缪泾啊缪泾,我漂泊的一生永远烙有你的胎记。”由《缪泾人》里走出的缪泾人,共赴乡约,慰以乡愁,也许不再何以情堪?此时此刻,奔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期待赋有更多江南水乡的“文学故乡”。

一张茶桌连接人与人

□王笛

成都的茶铺是共同兴趣爱好或者共同阶层之人的聚集地,就像一个“社会俱乐部”。茶铺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空间,虽然许多茶馆可以为各个阶层的人服务,但是相当多的茶馆存在着阶层自然的分野。

海粟在他的《茶铺众生相》里回忆,虽然成都有许多茶铺,但“茶客却是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的。有的大茶铺,平民百姓从不跨进去,而更多的小茶铺某些人则不屑一顾”。

中山街的茶馆邻近鸽子市,因而成为“养鸟人俱乐部”;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爱鸟人每天早起,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鸟儿的歌唱。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一些茶馆,例如中山公园的惠民茶社,就成为定期的雀鸟交易市场。

中山公园的乐观茶园也是养鸟爱好者的集中地,人们在那里做鸟雀生意,交流饲养经验,成为有名的“雀市”。1936年,一位记者在《新新新闻》上描写道,一次他到乐观茶园,发现里面热闹非凡,间杂着各种鸟叫。人们不仅在那里买鸟作为宠物,还买麻雀等在放生会释放。

记者以负面的语调描写这些待售的鸟不断地“悲鸣”。一个卖鸟食的小贩告诉记者,不少鸟是作斗鸟娱乐和赌博用的。这些斗鸟的食物颇为讲究,都是鸡蛋、鸡肉和牛肉,甚至还有人参等补品。在茶铺里卖作为鸟食的虫子,一天可以挣几千文。

看来人们说茶铺就是一个社会俱乐部,真是不假。同行业的、有共同爱

好的甚至完全不相干的人,都可以坐在同一个屋檐下,休闲、聊天或者读书看报、独自冥思,甚至度过一整天。难道还有任何其他公共场所,有茶铺这样的包容性吗?

茶铺就是会客室。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作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会家客颇不方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由于既方便又舒适,即使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铺作为他们的会客厅。茶铺成为人们聚会地,人们可以在那里会客交友,不用事先约定,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决定也是在茶铺里决定的。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传统在现代成都仍保留了下来。世纪之交,我做茶馆研究时,经常约一些长辈进行采访,他们几乎都要我去茶馆碰面。他们经常不用约定,也能在茶馆见到朋友,茶客们一般都有他们固定去的茶馆。

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铺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铺,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铺是个好地方。

茶馆是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的好场所。与西方工业国家和中国沿海大城市工人严格上下班工作制不同,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日程,他们的时间十分灵活。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沿街

营业的饭馆和茶馆”比作“英国的酒吧”,并评论说,这样的地方用于“社会闲聊”时,“危害极小”。

这些茶馆有着明显的社区特点,民国初期住在“推车巷”的外籍教师徐维理关于成都1920年代的回忆便提到,他所住小巷的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当他的一个朋友遇到麻烦,他们便到茶铺去讨论解决办法。

成都茶铺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摆脱简陋住所、休闲的公共空间。然而,我们也可以说,茶馆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了一个远离宽敞的私家宅院,接近更热闹鲜活的社会生活的聚会场所。茶客们一般都带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甚至在上班时间去茶馆喝茶,没想到被上司撞见而受到处罚。对茶客来说,闲聊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据周止颖《新成都》说,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隐私,妄论国帑”。

茶客的经济状况也反映在他们茶铺里的行为举止上。当经济恶化,顾客尽量少花钱。一次,一个人显得很有“派头”,为他人买了8碗茶,他的出手不凡使大家刮目相看,大多数人虽然也好面子,但也不敢轻易如此潇洒。

民间也流传不少关于茶馆中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下面是一则收录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中的传说:

有个人喜欢摆阔,成都人称“绷面子”,如果恭维他富,他便喜形于色,反之则怒气冲冲。有一天他在茶馆喝茶,茶客们都抱怨生活艰苦,每天只能泡菜下稀饭。他却说,“只怪你们不会

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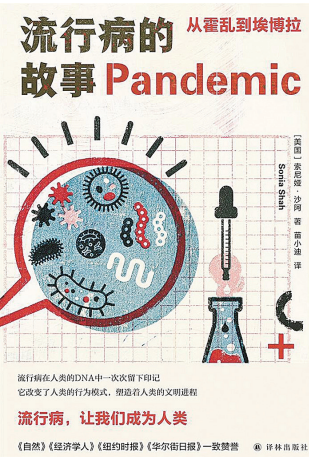


◆作者:[日]富田升
◆出版:中国画报出版社 2021年版

日本历史学者富田升教授撰写的《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从一位日本学者的角度,以义和团事件为焦点,考证了在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过程中,中国文物如何外流于世界,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文物外流如何影响了流入国的传统审美意识,又如何参与了传统审美意识的近代化转型。本书中,富田升用100余篇亲历者的证言、80余幅图片和20多张表格,追查了近代国宝外流的踪迹。重点关注日本人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古董商是如何参与这些文物外流过程,并通过分析历史留存下来的买卖记录和拍卖目录等,试图厘清文物外流的具体真相。

本书日文原版于2014年出版,是21世纪以来外国研究中国文物海外流失的一部重要学术论著。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朱诚如认为:“《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钩稽散在世界各地的珍稀资料,系统梳理出近代中国国宝外流的过程、渠道等以往鲜为人知的史实,为海外流失文物的鉴定与收藏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海外重要文物的追查和回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

流行病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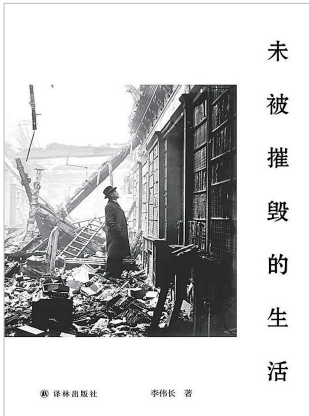


◆作者:[美国]索妮娅·沙阿
◆出版:译林出版社 2021年版

流行病始终伴随人类的进化历程,无论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基因变异,还是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甚至人们对美和浪漫的认知,都源自流行病的巨大作用。从鼠疫、霍乱和天花肆意横行到我们有能力打败流行病,人类走过了漫漫长路。流行病,让我们成为如今的人类。

过去数十年来,我们拥抱着工业化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生活方式,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感受到流行病的存在。然而,我们对流行病的认知充斥着误解、轻视或恐惧。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构建一个速度更快、织网更密的全球疾病监测系统?《流行病的故事》讲述了这一壮阔的征程,屡获大奖的科普作家索妮娅·沙阿展现了关于流行病鲜为人知的真相,深刻揭示了暗藏在每次疫情背后的气候、社会、文化等因素。流行病侵害着人类健康,有时甚至令国家陷入危机。但另一方面,它也改变了人类的进化轨迹,塑造了人类的行为与文明。人类与流行病之间的较量将持续存在。在后疫情时代,更需要借助科学与历史的力量,全球紧密合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流行病风险做好准备。

未被摧毁的生活



◆作者:李伟长
◆出版:译林出版社 2021年版

书与人生,可以互见。波德莱尔、福楼拜、契诃夫、钱德勒、纳博科夫、松本清张、格拉斯、奈保尔、桑塔格、布洛克、温特森……每个人自身所经历的生活,有助于理解一个好作家的长成,他克服了多少困难,化解了多少危机,以及他对生活会中断,但不可能被摧毁的信念。在评论家李伟长的阅读随笔集《未被摧毁的生活》中,作者勾点连线,问迹追踪,从一本书说到一个人,由一条线索牵出一段故事,从书里翻到书外,见证无数绚烂迷离的人生。

阅读随笔里有写作者自己,作者自言:“接受自己不完美的习性,接受自身的能力不足,接受自己的不乐意,都是属于我个人的写作意义。倘能引发别人一些微小的共鸣,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喜悦。”著名学者张新颖评价道:“伟长的阅读随笔里有伟长,他才写得好的,我读得兴致盎然。”阅读随笔可以看作一种渴望接上了另一种渴望,更准确地说,是同一种渴望的不断延展。根本上的“动力机制”和过程中的步步探索,使得这一类型的写作,比表面看起来要紧张得多,苦恼得多,兴奋得多,快乐得多。